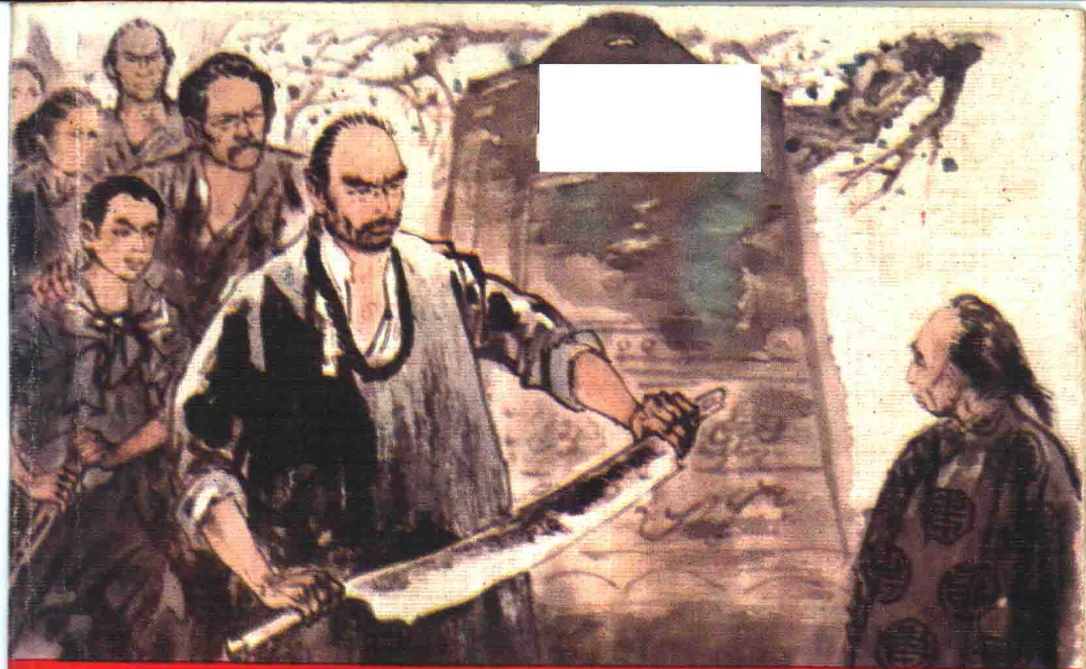




梁斌文集

红旗谱

梁斌文集 -

红旗谱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梁 斌 文 集 (一)

梁 斌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15 1/2 插页4 字数346,000

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,000

书号: 10151·875 定价: (平) 4.15元 (精) 5.70元



一九五二年摄于襄阳地委



一九五一年与夫人散国英摄于襄阳地委

果斌文集序

文集出版，編出下我自己作序，我覺得有些向題，是其中已經提過，沒有什麼再談的，限於篇幅，我只好勉力為之。

我以為，你我的作品，皆自己經歷過的主張，是得心应手，會到一處，和所求的東西，是能夠感到自己的誠意是變。否則，有經驗的談話，我會看出破綻的。

一個作家與獨具風格，和作品的氣質，經歷和愛好，是緊密相連的，也與你對創作的觀念有美。

書是讀出文章，必需根據歷史和現實

作者手迹

出版说明

梁斌同志是我国独具风格的著名作家，从事文学事业已逾半个世纪。所著长篇小说《红旗谱》等，深受广大读者喜爱，并于海内外赢得盛誉。这次《梁斌文集》所录，上起三十年代初，下迄文集编定之日，共为五册五卷。

文集第一卷为长篇小说《红旗谱》，第二卷为长篇小说《播火记》（《红旗谱》第二部），第三卷为长篇小说《烽烟图》（《红旗谱》第三部），第四卷为长篇小说《翻身记事》，第五卷为杂著。

长篇小说各卷，分别采用中国青年出版社、本社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最优单行版本，并以其他版本作为参照，经作者和编者反复认真校订，使其益臻完美、准确。

杂著卷，分类编年，汇集了作者多年来所撰写的散文、杂文、回忆录、创作经验、诗和剧本等。

为给读者和研究者提供参考，集末附录了张金池同志编写的《梁斌著作年表》。

文集的编辑出版，承蒙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支持，天津温超藩、王树人等同志热情协助编辑、校订，在此一并致谢！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1985年4月

22 20

自序

文集出版，叫我自己写序。我本来不长于此道，轮到自己头上，只好不得已而为之。关于我自己的作品，在文集中已经谈过不少，现在勉强再说几句。

作家，因为历史不同，文化政治水平不同，各人又走着一条不同的路。在我的童年时代，喜欢听故事，听一些民间传说，也喜欢看戏，这不能说对我以后的文学创作没有关系。

少年时代，有幸受到中国大革命的洗礼，我参加了革命的队伍，开始了革命生涯。其间，开始阅读革命的诗歌和小说。由于客观的影响，我喜欢创造社作家们的作品，喜读郭沫若浪漫色彩浓厚的诗歌、小说和蒋光慈的诗集《战鼓》。而后，进一步读鲁迅先生的小说和杂文。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我还读得懂；《坟》我读不懂，但因为我的崇拜，我还是要读的。

由于一个偶然的机，又开始涉猎中国文学。《花月痕》和《儿女英雄传》我是读了；但是象《三侠剑》、《小五义》我还未读过，当时叫做“看闲书”。当我懂得一些文学史的常识以后，开始读中国的古典小说《三国演义》、《儒林外史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，后来也读了《红楼梦》……等，受到作品中民族气魄的感染。我参加了气势磅礴的农

民运动，初次见到大世面。我幼稚的心灵开了一扇光亮的小门。这些，结合起来，对我以后的创作风格是有一点影响的。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，我开始读瞿秋白著作的《社会科学讲义》，以后，又陆续读了别的哲学的、社会科学的论著，如《辩证法唯物论》、《社会进化史》、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等书。我才懂得阶级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。在此时期，我又阅读外国文学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及辛克莱的《屠场》；进而阅读苏联早期革命文学和日本革命文学。这些作品，在我心里点起一把火，鼓舞我参加大规模的学潮斗争，参加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，以及为保二师“七·六”学潮而奔走、呼号。在写这一卷书时，我概括了两个学潮的斗争生活，把一些动人的人物、故事、情节、场景，概括在文集之中。

国难当头，华北各地农民拿起枪来，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，我以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笔法肯定了他们的英勇战斗。

学潮被镇压，敌人把我的名字刊在报纸上，战友们被关监狱，死亡逃散。在失学失业的情况下，我并不悲观，我鼓起勇气，流浪到北平。参加了“左联”，开始文学青年的生活；在北京图书馆里又读了《国家与革命》、《政治经济学》、《共产党宣言》等书。这时，又有机会重读三十年代革命文学和苏联早期革命文学作品。读过俄罗斯文学，我一时为托翁的作品所倾倒，连读了三遍《复活》。当然，我并未接受他的人道主义，因为我已经是一个战斗唯物论者。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我拿起笔来，开始了文学创作，向平津各报纸投稿，“占领阵地”。

在北平，我也学过日文，尝试着翻译，但保留下来的，只有两篇。

编在文集中一组早期的作品，看得出来，杂文学习鲁迅先生，小说则还未成熟，痕迹是明显的。生活虽然有了，一是在白色恐怖下，不得不深加含蓄；再者创作实践还少，技巧上还不够熟练，还是在所谓“练笔”。现在收在文集里，是为了保留下我曾经走过的足迹。发现这一组四十多年前的作品，是唐文斌同志的劳动成果。但此外，有些作品很难找到了。

在北平的几年中，出去了几个月，去搞军运。回来，被捕了一次，补上铁窗生活的一课；又出去一年，一是要避难，一是为了学习戏剧。可以说，这增加了生活的色彩。也曾参加了故乡农村的抗日救亡运动，深入农民群众中，进行抗日的宣传鼓动。当时亲眼看到国土沦丧，大军溃退，各个阶级、阶层的不同动向，亲身经历与组织了抗日武装斗争。为了抗日救国，挽救祖国的危亡，不惜牺牲，在战乱中奔波千里。

在深县敌后的抗日游击根据地，搞了几年戏剧，搞了几年乡村文艺运动。在频繁的游击生活中，写了五个剧本、几个短篇、一个中篇，都上演了，出版了。其中一个剧本，叫一个老朋友看了，他以此为蓝本写了一个剧本，也叫《堤》；当他笑着把这个剧本给我看时，我一笑置之。那时期过的是军事共产生活，没有私有观念，也无稿费制度。

在几年的戏剧、文学的创作实践中，我体验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，也实践了现实主义的表演体系。在文学创作中，在导演中，也探索到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问题。但是在游击环境中，今晨穿上鞋和袜，不知今夜脱不脱；轻装行军，走到哪里坚壁在哪里，如今一字无存。附在文集中的剧本，是我和别人合作、经过我参加演出的。青少年时代，写了几年诗，也只剩了两首小诗而已。

十万日军“扫荡”根据地时，领导机关和大部队从内线转移到外线作战，我和几个战友也转移到外线，转了个大圈，才回到故乡隐蔽，此时已经是岗楼如林，公路如网了。为了完成上级给予的任务，一夜之间奔走一百四十里，打了两次仗，爬了一个八里地高的山头。最后掩护我们下山的一班战士，被敌人俘虏了！

在边区文联住了一些天，读了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，家乡的人们还在水深火热之中，战斗生活不可多得，我不忍脱离生活。于是在一夜之中，穿过保定南关的大桥，回到平原上，到了白洋淀苇塘中的九分区司令部。回到故乡挖地道，几个村的亲友，也挖了地道。我回环转移，躲过敌人的“扫荡”，守着地道口读书写文章，从北平买来了《贝姨》和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。几年之间，也写了二十多万字。游击区无法出版，只好从平原寄到山里，由秘密交通站辗转邮递。这批作品是不易写成的，竟然丢失了！这是我平生最焦心的一件事。

我曾在一个县委工作了三年，了解了县委的生活和工作方式，了解了区委的工作和生活、村干部的工作和生活情况。在一个地委工作了三年，又了解了地委的工作和生活方式。这使我掌握了很多情况，例如中央的一次指示，经过省、地、县、区，直至村级，在广大群众的生活中，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变化，出现什么样的问题。这种敏感和预见，得来是不易的。长期蹲点和短期蹲点、走马看花，对此绝不相同。而做为一个作家，这种敏感和预见是绝对有益的。

在长期蹲点期间，有四年是搞土改运动：两年在华北，搞一个试点村；两年在华中，又搞了一个试点村。我了解了很多

农民的形象和性格、生活方式；也了解了地主们的形象、性格和生活方式，在几年中掌握了农民运动的规律。但是在写《翻身纪事》的时候，我并没有完全按实际生活来写，因为有的地方受了“左”的影响。我是按着党中央一九三三年两个土改文件的政策精神来写的。有实际经验的读者会看得出来的。

在几十年的工作和生活中，我蓄集了大量的素材，记录了许多人物、故事、情节和典型性的群众语言。

直至全国土改完成，我才放下心来。当我开始坐下来写作时，上级又调我进了城市，在一个报社工作。在这个报社里，我又认识了一些知识分子，和他们做了朋友。因为我做农村工作久了，不适应报社的生活。我开始构思写书。不久，我又回到文艺工作的岗位上，开始了专业写作。立志以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，写出民族气魄的，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；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
病了几年，又遭遇了十年动乱，耽误了几部书。在这部文集中，我没有写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，这是我终生的遗憾。我只好回忆录的体裁把过去的战斗生活记录下来。

我觉得，一个作家的作品，写自己经历过的生活，是得心应手的。看到一点，和听来的东西，必须联系到自己深厚的生活基础，否则有经验的读者会看出破绽的。

一个作家作品的独具风格、别开生面，需要下很大的气力，需要绕开古今中外几十个、几百个作家的文学风格。再者，也和作家的气质、经历、爱好、有相应的关系，也联系到作家的审美观念。虚构，必须根据时代背景、历史的和现实生活的规律性，加以理想、联想和幻想，塑造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和性格。我相信，诸葛孔明的《空城计》和《借东风》是艺术真实，不

是现实的真实。但是观众看了，认为是可信的。这是作家的大手笔，也和民间传说有相应的关系。编造、公式化和概念化的东西，是缺乏实践，生活贫瘠的表现，必须回到生活中去，才能解决问题。

我觉得，文章还是多修改几遍为好，生活和人物熟悉的地方，偶然也可能一挥而就，但毕竟是不可多得的。

想写重大题材，只靠采访是不行的，只是走马看花也不行。只有深入生活，参加实践，才能解决问题。想写工人，就要在工人生活中流下一点血汗；想写农民，就要在农民生活中流下一点血汗。想写知识分子，就要和他们交下朋友，了解他们的劳动过程，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创造辉煌业绩的心情。

现在，呈献在热情的读者面前的文集，象一面镜子，使得我觉得在文学生涯中，写的东西太少了！但事到如今，也无可奈何了，我今年已经是七十一岁了。

今后只能写一些小品和散文，写不了长篇了。使用录音机和打字机，在我来说，是不习惯的。我也没有这个条件。

这部文集，从旧社会写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生活。在这里，有亲身经历，有所见所闻，也有虚构。以我自己的审美观念和创作个性，写了人与人的关系，人间的悲欢离合，写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命运和悲欢。写了正面的英雄，也写了所谓反面的“英雄”。写了第三派势力。写了各个阶级、阶层的人物，有男有女，有老人也有青少年。从老将军写到琐细的小人物。各有各的精神面貌，各有各的形象、性格。热情的读者去自由品评吧！

此外，我就贾湘农这个人物说几句话：有的读者说这个人物写得好，有的读者说这个人物写得不够成熟。比如一个美国

人，来天津大学进修，她是学汉学的，而且以《论高阳棉布》的论文，获得博士学位。她对“高阳棉布”很有兴趣，并且亲自走了一趟。她就看着这个人物写得好，“虽然写得好，也遮不住朱老忠这个英雄人物”。这只是一个例子，其他读者也有这么说的。

关于早期的革命领导形象怎样写，这确是一个问题。举博蠡中心县委为例，它是于一九二五年建立的，我于一九二七年参加共青团。博蠡中心县委的书记，我也见过，他结婚时，我还给他画过两张水彩画。他现在还健在，已是八十余高龄。我们结为老朋友，常有往来。博蠡中心县委的委员刘显增同志，当时是我们的党团支部书记，是我们的数学教员，现在还健在。此外，还有国文教员宋卜舟，国画教员张化鲁。而且据刘显增同志说，他是一九二五年从河北省委到蠡县工作的，当时的河北省委刘延年等同志都是青年人。

我还看见过当时的北方局的视察员翟沼池和梁度世同志（此人还健在）都是青年人，都是知识分子。我还听过翟沼池的讲话，煽动性很强，但是满口的知识分子语言。以上所谈这些人，当时他们怎样到工人中、农村中去进行工作，还不象贾湘农一样？我概括得再高，也不过如此了。

博蠡中心县委，一个最突出的特点：是在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之后，未从国民党的政权机关、国民党部中撤出共产党员；在华北来说，这是独一无二的，在路线上来说，是正确的。这个问题，在文集中已经有所反映。

关于高蠡暴动中的湘农，当时的政治委员是贾振书同志，他是二师高级班毕业同学，这个人我是认识的、熟悉的。他曾当过保定市委书记，当市委书记可以，他怎样去当这个政治委

员？这就是一个问题了。因为他没有军事经验，没经历过战斗生活。

湘农这个人，据说搞过军事运动，他是南方（湖南）人，听不懂北方语言，说话得用“翻译”，不懂地理民情。指挥战争是会有困难的。据白坚同志说，高蠡游击战争失败后，他回到北京，曾和白坚同志同住过。省委批评他右了，他不同意。白坚同志说：“这个人不错！”关于湘农的情况，我只知道这么一点。

一九三九年，我曾到一个游击部队工作，当政治委员。大队长是一二〇师给的一个干部，是个农民，参加过茶陵暴动，在一二〇师当过侦察员，当过侦察连长，派来当大队长。他这个南方人也不懂北方话。而我呢，说实在话，只看了一本毛主席的《论游击战争》，一本《论持久战》，以此为资本，指挥这个部队打了一年游击；指挥了两次战斗，活捉了一个大汉奸，主要是熟悉地理民情。我要是不当这一年的大队政治委员，没有这点游击战争的生活，我写不出高蠡游击战争的这些战斗。这些战争场景，我是用我的生活补充上去的。

高蠡游击战争在一九三二年九月，二师“七·六”学潮在当年七月。关于两个事件的背景是：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，日本关东驻屯军炮击北大营兵工厂，开始了沈阳事变。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，日军占领榆关。一月二十八日，上海十九路军开始抗战。此时日本特务、日本浪人公开在天津北平活动。有扮为小商人、扮为日本和尚的特务深入华北内地活动，华北局势已危在旦夕。

天津、北平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已经起来，能不波及到保定？国难当头，保定二师建党较早，党团员较多，能不掀起抗

日救亡运动？我不同意有些人给二师“七·六”学潮扣上什么样的帽子。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二十二、三岁、十六、七岁的青年人（有两个十四岁的，被捕后未被判刑，因为不到法定年龄）。血气方刚，爱国心切，被反动派屠杀，逮捕了。难道北平、天津学生运动那么大势头，保定则毫无动静就好了？

根据当时估计，为了抗日，敌人不会下死手的。为了此事，解放后，有人走访了当时的河北省政府主席、河北省政协委员、东北军将领于学忠。据他说，他当时不知此事。这么大的事情，当场死十数人，伤四人，不经过省长批示，有这个道理吗？当时对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，但怎演变成惨案，也就难说了，世间事务是复杂多端的。

高鑫游击战争的失败，也是一样。也不过是蒋介石的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政策和“不抵抗主义”的后果而已。高鑫人民拿起枪来抗战，迎接红军北上，炳耀天日，万古流芳！

一九三三年的上半年，冯玉祥将军在张家口兴兵抗日，号称同盟军。河北省委各县都派党团员前往参加，我们县去的是李希周（此人健在）和韩福全二同志。当时的抗日同盟军大战长城的冷口、喜峰口，收复多伦，全国各地报纸都登头版头条，结果也失败了。总结一句话：“当时反动势力还大，抗日的势力还小。”但是抗日的势力虽小，为了国家民族的危亡，还是要抗日的。“不抗日勿宁死”，这是当时青年中流行的一句话。

文集的出版，得力于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和许多热心的同志的帮助，这是应该感谢的。

一九八四年十月七日

第一卷

长篇小说

红旗谱